

说东周

话权谋

刘先廷
姚有志
编



解放军出版社



说
东
周

话
权
谋

刘先廷
姚有志
编

说东周 话权谋

刘先廷 姚有志 编

解放军出版社出版

(北京平安里三号)

新华书店北京发行所发行

北京京辉印刷厂印刷

787×1092毫米 32开本 10.625印张 225千字

1987年11月第1版 1987年11月(北京)第1次印刷

印数1——60,000册

ISBN 7-5065-0186-4/E·118

统一书号: 5185·166 定价: 2.10元

前 言

军事谋略，作为巧妙利用客观规律的战争指导艺术，历来为兵家所重视。“运筹帷幄之中，决胜千里之外”，固然可以看出谋略的巨大作用；战场上“审时度势”，因敌制胜，同样体现着谋略的无比威力。一切在战争舞台上导演有声有色、威武雄壮活剧的将帅和指挥员，无不具有高深的谋略造诣。

东周是我国历史上由奴隶制向封建制过渡的社会剧变时期。这期间，东周列国兵刃相见，几乎是年年烽火，岁岁征战，战争激烈而又频繁。在刀光血影的军事斗争中，又伴随着错综复杂的政治的、外交的和思想的斗争，其斗争手段又是如此的争奇斗艳，惊心动魄，从而为后世留下了极其丰富的谋略遗产。脍炙人口的历史小说《东周列国志》，不仅生动地叙述了东周五百年间的主要历史故事和战争实践，而且使许许多多的令人拍案叫绝的奇谋妙策跃然纸上。更加难能可贵的是，这部历史小说所描写的事实，极少作者的虚构和夸张，所言所论与历史典籍基本上保持一致。也许是由于军人职业的缘故，我们在阅读《东周列国志》的时候，对其中谈到的谋略思想抱有浓厚的兴趣。这本奉献给读者的《说东周·话权谋》，就是从东周列国的诸多故事中，从谋略的角度抽象和概括出来的。

军事谋略属于观念形态的范畴，它产生于战争活动之中，又反过来服务于战争。为了使读者便于了解东周时期的谋略思想，有必要介绍一下这一时期的社会状况和战争情况，谈谈东周时期军事谋略的概貌和产生的时代背景。

(一)

公元前1099年，武王灭商，建立周朝，都城设在镐京（今陕西省西安附近）。公元前771年，周幽王被犬戎杀死，新继位的周平王为躲避犬戎骚扰，将国都东迁洛邑（今河南省洛阳王城公园一带）。史学家把平王东迁之前的周朝称为西周，把东迁之后到公元前221年秦始皇统一中国称为东周。西周与东周总计八百七十余年。

东周又分为“春秋”和“战国”两个历史阶段。

春秋时代（公元前770年——公元前403年），因比较权威的鲁国编年史《春秋》一书而得名。这部史书记录了从鲁隐公元年（公元前722年）到鲁哀公十六年（公元前479年）间十二位国君共二百四十四年的各国大事，和从平王东迁（公元前770年）到三晋封侯（公元前403年）揭开战国序幕的时间大体相仿。

“战国”一词，在东周时期就使用过，当时不过只是用来称呼那些连年参加战争的强国的，到西汉末年刘向编辑《战国策》一书时，才开始把战国作为特定的历史时代的名称。这一历史时代大体包括从公元前403年三家分晋到公元前221年秦始皇统一中国的一百八十多年的时间。

从社会发展史的角度看，春秋战国之际，是战国的封

建制取代隶奴制的社会大变动、大革命时期。旧的奴隶制的生产关系，此时已经成为新的生产力发展的桎梏；而新的封建制的生产关系在奴隶制的母胎里也已逐渐发育成熟。这样，公元前五世纪至四世纪的春秋战国之交，也就成为中国奴隶社会与封建社会的一个界标。当然，新旧两种社会制度的交替，不是通过和平过渡的方式，而是通过阶级斗争的最高形式——战争实现的。从《东周列国志》也可以看出，当时华夏诸国与戎狄族的战争，新兴地主阶级夺取政权的战争，是交织在一起的、连绵不断的。据鲁史《春秋》不完全记载，在春秋时代将近三百年的时间里，就有过四百八十三次军事行动。《左传》所记载的战争，也有四、五百次之多。

平王东迁之后，戎狄部族继续威胁着东周的政权和社会，它逐步向黄河流域进逼，伐郑击齐，亡邢灭卫，甚至攻打过衰微着的周王朝的京城。这种情势迫使混战中原的华夏诸国暂时联合起来，抵抗处于游牧阶段，生产力极为落后的戎狄对中原的进犯与破坏，保卫中原文化。故自春秋中期以后，戎狄的威胁才大为减轻。然而，戎狄降服，诸侯兼并和大国之间争霸的战争却日益加剧起来。

周王朝封国林立。据传说，周朝初期的公封有五等：公、侯、伯、子、男，大大小小计一千七百七十三国。春秋之世，诸侯之间擅兵征伐，尚存一千二百余国，其中成型的封国一百三十一一个。由于东迁后各封国间政治经济发展的不平衡和周王朝的衰落，诸侯国失控，大国企图架空周王朝由自己来维护奴隶主专政，因而出现了兼并争霸的局面。郑国首先站出来企图号令诸侯，但霸业未成齐国即代之而兴。齐桓公北定诸戎，侵蔡伐楚，观兵召陵，成为

中原第一霸主。齐桓公死后，宋襄公想代齐而居霸位，但力不从心，昙花一现。待晋国勃起，几代称霸，秦国也东进饮马黄河，楚国亦挥戈向北，进击中原。于是，从公元前632年的晋楚城濮之战起，以晋、楚、秦、齐为中心，接连爆发了殽之战、彭衙之战、令狐之战、大棘之战、沁之战、麻隧之战、鄢陵之战、栎之战、平阴之战、湛阪之战、朝歌之战等多次有名的大战，霸主迭现。继晋文公重耳开创了晋国的霸业之后，又陆续出现了楚庄王、秦穆公等有雄才大略的霸主。公元前546年的弭兵大会之后，中原争霸的烽烟刚熄，后起的东南方的吴、越又烧起了另一次争霸的战火。但是，随着社会生产力的发展和阶级斗争的深入，奴隶社会中的基本矛盾——奴隶和奴隶主之间的矛盾日趋尖锐，新兴地主阶级与没落奴隶主贵族之间的矛盾也日趋明朗，兼并战争与争霸战争开始转变为各国内部的夺权战争。所以，吴、越两国间的争霸战争，已经是春秋时期争霸战争的尾声。经过两百多年的兼并与争霸战争，封国的数量大为减少。到战国开始时，只剩下秦、楚、齐、燕、韩、赵、魏七个大国和十多个奄奄待毙的泗上小侯了。

春秋战国之际，通过一系列的战争和长达一百多年的变法运动，新兴地主阶级剥夺了奴隶主贵族的特权，登上了政治舞台，先后形成并巩固了一些封建的中央集权国家。公元前562年，鲁国的从奴隶主阶级中分化出来的新兴地主阶级代表三桓（即季孙氏、叔孙氏和孟孙氏），首先在鲁国“三分公室”和“四分公室”取得了政权；公元前550年，晋国的新兴地主阶级一举打垮了奴隶主贵族，后来的“三家分晋”只是地主阶级内部互相兼并的结果；公元前481年，齐国的田氏三战三捷，彻底扫荡了腐朽的贵族

势力；公元前479年，楚国的白公胜厉剑而起，劫夺王宫，战火燃遍江、汉、中原……。新兴地主阶级凭借奴隶和平民的支持，取得了政治上和军事上的胜利，新型的封建制度在战争的烽烟中得以诞生。到春秋末期，已经形成的七个大国即所谓“战国七雄”，待内部比较稳定并消灭了周围的小国之后，在各自增强实力的同时，相互间便开始了以中央集权的统一国家代替诸侯割据称雄的战争，把春秋时期的兼并与争霸战争推向了更为剧烈的阶段。

公元前354年，当时七雄中最强大的魏国率宋、卫联军攻赵，次年赵向齐求救，齐军用孙臆之谋，“围魏救赵”，在桂陵大败魏军。公元前342年，魏国向韩国进攻，韩求救于齐，但齐国未马上出兵，到次年韩魏打得精疲力竭时才派出十万大军，在马陵伏击魏军，魏军惨败。同年，齐、秦、赵三面攻魏，魏向秦反攻，又遭失败。公元前340年，魏国攻秦，魏又失利。公元前338年，秦攻魏，秦军获胜。从此，在西方强大起来的秦国，不断蚕食魏国及其它山东各国的土地；东方齐国经过齐威王的改革，日益强大，在桂陵和马陵之战以后，成为东方强国。战国中期的合纵连横多是围绕着这两大强国展开的。“纵者，合众弱以攻一强也；而横者，事一强以攻众弱也。”（《韩非子·五蠹》）合纵打击的对象是秦、齐，参加的国家多少不一。公元前284年六国攻齐之后，齐国的实力受到极大削弱，自此一蹶不振，只有强秦占据着中心舞台，合纵进攻的对象只有秦国了。与此相反，连横始则以秦、齐为中心，后以秦国为中心。合纵连横的格局经常变化，“朝秦暮楚”说的就是战国中期的情况。当秦国在战国后期可以独雄天下之后，又采用“远交近攻”之计，瓦解其它国家

的联合，一步步地翦灭邻国。起初虽偶有赵国这样的强敌能与秦抗衡，在阏与之战中曾大败秦军，但在此后不久的长平之战中，秦军却大败赵军，使赵国的人力物力财力受到了极大削弱。经过进一步的蚕食山东诸国，秦军在战略上占据了主动地位。从公元前230年开始，秦国象秋风扫落叶那样，居高临下，向山东各国大举进军，仅用了不到十年的时间，就将韩、赵、魏、燕、楚、齐各个击破，于公元前221年，完成了海内一统的大业。

战国时期争取封建统一的战争，比之春秋时期的兼并战争，已经有了重大发展，呈现出许多新的特点：

第一、战车列阵作战逐步被步骑兵的野战包围战所代替。春秋时代，战争双方往往先把战车排列成一定的队形，然后正面冲突，决一胜负。公元前707年，郑军与“王师”、蔡、卫、陈国交战，曾以“鱼丽之阵”将王师打败。城濮之战，仅晋军就有各种类型的战车“七百乘”；大棘之战，郑军俘获宋军的甲车即达四百六十乘。当时军队中也编有步卒，但只居于从属地位。无论是致师（侦察性的挑战）、决战还是追击，双方都使用由甲士驱使的马拉的战车。这种车战，突击力强，但受地形条件的制约较大。到了战国时期，由于战场范围的扩大，机动作战和攻坚的需要，步兵占据了主要地位。历次交战，双方都要动用大量的步兵进行拚杀。如长平之战，秦赵两军一开始就以步兵相接，反复争夺，斩将陷垒，最后还是以几十万步兵拼搏解决了胜负。当然，步兵地位的上升并不意味着车兵的被淘汰，而只是说它的作用不同了。杜佑《通典·兵一》引李靖的话说：“步为腹心，车为羽翼，骑为耳目，参合迺行。”兵种多了，就出现了一个“参合”（协同）

问题，虽然在这种“参合”中不再是车兵扮演主角而是由步兵扮演主角了。战车虽然退居于次要地位，但车战并未绝迹。屈原在《国殇》里描写了车战的悲壮情景：车轴头相碰，短兵相接，阵势乱了，马死人伤，战鼓冬冬，鬼哭神号，尸骨盈野。可见战国时的车战仍很激烈并具有相当的规模。

第二、骑兵作为一支作战部队在华夏诸国相继建立。春秋初期，马拉战车，很少单骑。秦国护送重耳归晋所派的“畴骑”，近年来有人考证说那就是骑兵。但直到战国中期赵武灵王进行军事改革，实行“胡服骑射”之后，骑兵才真正作为完整的作战部队出现在华夏诸国的历史上。赵国在和东胡、林胡、楼烦的战争中，骑兵部队发挥了重要作用。当然，骑兵发展为一个独立的兵种，也经历了一个过程。春秋战国之交，骑兵和车兵还是混合编组的。例如，知伯要围攻赵国，赵襄子曾派延陵先带着兵车和骑兵去晋阳部署防务（《韩非子·十过》）；“公孙鞅因伏卒与车骑以取公子卬”（《吕氏春秋·无义篇》）；《战国策·齐策一》载，孙臆对田忌说，“使轻车锐骑冲雍门，若是则齐君可正，而成侯可走”。这些都说明当时骑兵尚未独立出来。待骑兵独立之后，主要也是配合步兵作战，作为奇袭、冲锋之用。所以战国时代各国兵员，“带甲”都有几十万至百万，骑兵仅五、六千至万余。对付以骑兵为主力、勇猛善骑的胡兵，赵武灵王不得不以骑兵作主力与之进行针锋相对地斗争。孙臆曾经指出：“用骑有十利：一曰迎敌始至；二曰乘虚背敌。三曰追散乱击；四曰迎敌击后，使敌奔走；五曰遮其粮食，绝其军道；六曰败其关津，发其桥梁；七曰掩其不备，卒击其未整旅；八曰攻击懈怠，出其不意；九

曰烧其积聚，虚其市里；十曰掠其田野，系累其子弟。此十者，骑战利也。夫骑者，能离能合，能散能聚，万里为期，千里而赴，出入无间，故兵离合之兵也”（《通典》第一四九卷）。可见，骑兵具有高速机动、远程奔袭等兵车、步兵所不具备的优越性。

第三、战场由陆地扩展得江、河、湖、海之上。《东周列国志》里反映了这方面的一些情况。这在春秋之前是不曾有过的。《越绝书》记载，战国时的大型战船能乘九十人左右，水军装备有护体的铠甲和兜鍪以及远射的弩。《墨子·鲁问》说，公输般创造了水军使用的“钩拒”，“退者钩之，进者拒之”。公元前485年，一心想称霸中原的吴王夫差，从海道进兵伐齐，这是中国最早的海军。故宫博物院所藏的一件传世的水壶上刻有水战的画面，有助于我们了解当时的水战情况。

第四、战争的规模不断扩大。战国时期，战线延长了，战场扩大了，部队增多了，一次交战动辄就是几十万大军，相持数月甚至经年，“能具数十万之兵，旷日持久数岁”（《战国策·赵策二》）。如长平之战，战线绵延百余里；战幕从四月拉开，到九月赵军投降，前后持续半年之久。赵军四十万降卒，全被秦军坑杀，若连战争中的伤亡在内，赵军参战兵力当在五十万以上，秦军估计也不会少于此数。这样的规模和气派，春秋时期是不曾有过的。

第五、武器的质量、性能和种类都获得了长足的进步。春秋时代以至以前的武器都是铜制的，种类主要是戈、矛、剑、戟、弓矢等进攻性武器，到战国之后，武器质量有了明显提高，至今还有春秋战国之际的铜质名剑——勾践剑传世。随着冶铁技术的进步，铁制的矛、剑、

戟也造出来了。“宛钜铁铍，惨如蜂蚤”，楚国宛地的钢铁所制的矛，象蜂、蝎一样厉害，性能比铜制的又有提高（《荀子·议兵篇》）。秦昭王说，“吾闻楚之铁剑利”（《史记·范雎列传》）。不仅如此，春秋后期发明了可以远射的弩，也从楚、吴、越等南方国家传到了北方诸国，得到了普遍推广。除弩之外，还发明了攻城的云梯和舟战用的钩拒。随着进攻性武器的进步，防御武器也相应地有了提高。皮甲仍在使用，铁胄已经出现，作战时士卒可以“以铁为臂胫之衣”（《史记·苏秦列传》），来防护身体了。

除了上述几点之外，常备军的建立、将相的分职、城市的设防、长城的修筑等等，都是在这个时期才出现的新现象。

（二）

恩格斯曾经说过：“新的军事科学是新的社会关系的必然产物”（《马克思恩格斯全集》第七卷第562页）。春秋战国之际奴隶制被封建制所取代，使兵学（军事科学）达到了划时代的水平。频繁战争，造就了一大批杰出的军事家和一代名将，如管仲、孙武、乐毅、白起、吴起、孙臧、廉颇、司马穰苴、蒙恬、王翦……而且其中的许多人集文武于一身，不仅有叱咤风云的战争实践，而且著有兵书传世。这些兵书，为后世的兵学理论的发展奠定了坚实的基础。尤其是与儒家鼻祖孔丘大体同时的“兵圣”孙武，把兵学理论推向了时代的顶巅。他所撰写的《孙子兵法》，是我国现存的最早的一部兵书，书中总结了当时的战争经验，揭示了一些普遍战争规律和战争指导规律，充满

着朴素的唯物论辩证法思想，不仅是研究古代军事科学而且也是研究中国哲学思想的重要文献。进入战国，孙臆兵法、吴起兵法、司马穰苴兵法等等兵家著作相继问世。汉初张良、韩信整理兵书，共得一百八十二家，其中战国兵书占绝大多数。军事科学是战国时期最发达、最繁荣的学问之一。当时的诸子百家争鸣，兵家最为活跃。由于战争的影响面大，其它诸子也多有议兵的言论和著作。如孔丘、墨翟、老聃、孟轲、庄周、晏婴、商鞅、荀况、韩非、吕不韦等等一代名流，都从不同的角度涉足兵学，而且许多见地不在当时的军事家们之下。象战国初期的思想家、墨家学派的创始人墨子，专论防御的著作就有十一篇之多，可称得上是我国历史上第一位防御理论的大师。

谋略在军事科学中占有重要地位。《汉书·艺文志》把兵家著作分为兵权谋家、兵形势家、兵阴阳家、兵技巧家四类，兵权谋家被排在最前面。兵权谋家的特征在于强调“以正守国”，“以奇用兵，先计而后战”，追求谋略的科学制订和巧妙运用。《汉书·艺文志》著录有十三家（内汉代有两家），以《孙子兵法》和《孙臆兵法》为主要代表。兵权谋家是兵家学派中最主要的一派。兵形势家讲求“雷动风举，后发而先至，离（分散）、合（集中）、背（后退）、乡（向前）、变化无常，以轻疾制敌”。其实，这种机动性和灵活性是包括孙武在内的当时的军事家所普遍强调的。《汉书·艺文志》著录的兵形势家有十一家（汉代有三家），现存的只有《尉缭子》。从该书的内容来看，兵形势家虽然也讲谋略，但更强调确立必胜的形势。兵阴阳家讲求“顺时而发，推刑德，随斗击，因五胜，假鬼神而为助”，带有一定的迷信色彩。兵技巧家讲求武艺

训练和体育锻炼，掌握战斗器械的使用技巧和具有擒拿格斗的本领。显然，和形势、天候、技巧等比较起来，谋略属于更高层次的军事科学。“非计策无以决嫌疑，非谲奇无以破奸息寇，非阴谋无以成功”（《黄石公三略·中略》），所以对于谋略是需要着意研究的。

那么，谋略究竟是个什么概念呢？《吴子兵法·图国第一》中指出，“谋者，所以远害就利”也；《六韬·文韬·六守》中说，“事之而不穷者谋也”；《尉缭子·战权第十二》认为，“战权在乎道之所极”，说是战争的权谋在于对战争规律的深刻理解；《司马法·定爵第三》则强调，“大小，坚柔，参伍，众寡，凡两，是谓战权”。以上这些，从不同的侧面论述了谋略的作用、性质、本质和内容，并涉及到了谋略与战争规律的关系。由此可见，谋略就是克敌制胜的巧妙用兵的最佳方法，它必须具有用力省而成功多的特点。战争是一个充满盖然性的领域，矛盾和斗争纷纭复杂。要正确处理敌我、攻守、胜败、虚实、正奇、强弱、劳逸等等一系列对立的关系，要恰当运用示弱、示强、疑兵、伏兵、佯动、假道、姑予等等一连串的谋略手段，均有赖于战争指导者对战争规律的正确认识，对战争形势的精当分析，有赖于敏锐聪睿的哲学头脑。最好的战争谋略总是与对战争规律的深刻理解相联系，离开对战争规律的深刻理解与切实把握，是谈不上什么谋略的。而要深刻认识与把握战争规律，则必须有一副唯物辩证的头脑，具有创造性的科学的思维方式。强调“上兵伐谋”的《孙子兵法》，之所以和《老子》五千言一样，同为研究中国哲学思想的重要文献，原因就在于谋略与哲学是一个不可分割的有机统一体。不探求军事哲学，就谈不

上把握军事谋略的精髓。

我们在研读《东周列国志》和其它有关史书的过程中体会到，军事谋略伴随着社会的进步、战争的发展和人类思维能力的提高，也经历了一个由初级到高级，由简单到丰富的演进过程。据记载，在东周以前，虽已有几十部兵书问世，但基本上已全部散失。军事谋略的真正大发展是在春秋战国这一社会剧变时期。《汉书·艺文志》在讲到春秋战国时期的用兵特点时说：“……汤武受命，以师克乱而济百姓，动之以仁义，行之以礼让，《司马法》是其遗事。自春秋战国，出奇设伏，变诈之兵并作。”这一用兵变化，《孙子兵法》中有精辟地概括。用兵诡诈的思想，在晋文公时狐偃（舅犯）就提出来了。他说“战阵之间，不厌诈伪”（《韩非子》）。当时颇有争论，狐偃再三陈说利害，“不谓诈其民，请诈其敌”，讲的是楚晋战争的具体问题。孙武则从更高的角度谈了用谋的重要性，认为“此兵家之胜，不可先传也”，是军事家取胜的奥秘所在。

谋略作为智慧的结晶，是多层次、多性质和多样式的。其中有关于战争全局的谋略——战略，也有关于战争局部的谋略——战役或战术；有进攻性的谋略，也有防御性的谋略；其种类有显形、呈势、情报、利欲、间谍、心战、伪示、激将……形形色色。谋略又有广义和狭义之分。广义上的谋略包括政治、外交、军事等所有社会活动形态方面的奇谋策良。我们所谈的谋略，包含了广义的内容。同时，我们也感觉到，随着历史的发展和科学技术的进步，战争这一人类互相残杀的怪物显得愈来愈怪了。书中谈到的某些谋略随着时间的流逝和时代的变迁，逐渐失

去了原有的光辉。这里之所以仍把它们作为谋略来阐述，是因为它们在历史上曾经发挥过作用，也为了给人们研究我国军事谋略的发展演变提供一些素材。还需要说明的是，古代将帅和智能之士在施计定谋时，往往是几谋并用，或者在一主导性谋略下附之以若干辅助性谋略。也就是说，既有单一性谋略，也有复合性、综合性谋略，而且在具体运用时，后者比前者表现得更为普遍些。因此，用谋成功者多是综合运用多种谋略手段的结果，行动失算者也同样有着多方面的教训。但是，我们为了突出其重点，每篇一般只选择和围绕一种谋略加以阐述，而对其从属性的谋略则未更多的涉及。

在中华民族悠久灿烂的文化宝库中，军事典籍和军事谋略遗产占有重要的地位，而且在这方面有着举世瞩目的辉煌成就，两千多年前的《孙子兵法》至今仍被一些发达国家奉为兵学圣典，就是一个生动的例证。在新的历史条件下，为了把具有中国特色的军事科学发扬光大，有必要批判地吸收其中的精华，以达“古为今用”的目的。我们之所以不揣固陋，伴灯笔耕，拿出了这本《说东周·话权谋》，目的全在于抛砖引玉，以期引起大家的兴趣，求得对军事谋略领域研究的进一步繁荣。

这本文集，是由杨家祺、吴玉强、刘先廷、姚有志等同志分头撰写的，最后由刘先廷、姚有志作了内容上的协调和文字上的增删。由于我们的知识水平有限，而书中所涉及的内容比较庞杂，错误一定不少，欢迎大家批评指正。

刘先廷 姚有志

一九八七年四月于军事科学院

2017/1/9

目 录

前言	(1)
先发制人的先例	(1)
围三缺一	(4)
郑庄公假当差的联想	(7)
合围与解围，拉拢与分化	(10)
调虎离山计	(12)
假托王命	(14)
利而诱之	(16)
先拣弱的打	(19)
“远交近攻”的发端	(21)
音乐与战斗力	(24)
巧取蚌鹬之利	(27)
临机决事的典型	(29)
侠客之祖——曹沫	(32)
谋略与人才	(35)
示以欲伐	(37)
“空城计”的模特儿	(39)
勿越其伏	(42)
老马识途与足智多谋	(45)
罪张而诛之	(47)
戎狄的伏击与卫懿公之死	(50)
隐蔽战略企图一例	(52)